

# 论法人权利能力分层理论的构建 及其在公司法上的意义

李有星,曹邵鸣,刘 维

(浙江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制度的核心,是法人得以像自然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独立地参与社会交往的理论支撑。然而,权利能力本身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和作用的能力要素,长期以来未能将其区分开来,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引起了不少争议和矛盾。权利能力分层理论就是将权利能力划分为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前者赋予法人以主体地位,后者限定法人的具体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的范围。权利能力、人格与分层理论的关系十分密切,权利能力分层理论可以在公司越权行为、公司人格否认和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领域适用。

**[关键词]** 权利能力; 分层理论; 抽象权利能力; 具体权利能力; 公司的人格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6)01 - 0158 - 08

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的核心,权利能力为法人之所以可以像自然人那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德国民法典首创“法人”这一概念以来,权利能力便与法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法人制度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就法人的本质而言,除了已遭到普遍反对的否定说以外,无论是拟制说还是实在说,均承认法人要具有权利能力<sup>[1]503</sup>。

尽管权利能力在民法学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学者们对该理论所做的研究相当的少。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鲜有以此为议题的;民法教科书及专著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都是大同小异。这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权利能力已是一种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理论,没有再行研究之必要。问题是,现行的关于法人权利能力理论存在诸多缺陷,在不少方面自相矛盾,大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拟在考察权利能力本源以及借鉴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构想,并试图以此去解释当前公司法理论上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 一、法人权利能力分层理论的构建

权利能力的本源可溯及罗马法上的人格权制度,但其正式创立却要归功于德国民法典。

**[收稿日期]** 2005 - 03 - 21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规划办教育部重点项目(DIB010720);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N02ZF8)

**[作者简介]** 1. 李有星(1962 - ),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教授,主要研究经济法、商法; 2. 曹邵鸣(1981 - ),男,湖北枣阳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3. 刘维(1981 - ),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作为大陆法系始祖的罗马法中找不到“权利能力”之说。但可以看到“persona”这样的词汇,可以译为“人”或“人格者”,也可译为“面具”,意指演员所扮演之角色,后来用来指权利主体的各种身份。

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创立了法人制度,并且在吸收和借鉴罗马法的人格权制度及法国法的“人格”学说基础上,首创了“权利能力”一词,不仅将其赋予自然人,而且赋予法人,从而为“法人”这一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人格的依据从法国民法上“人的理性”,演变为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从而完成了法律人格的依据从自然法向实定法的转变<sup>[2]</sup>。正是赋予法人以权利能力,才使得法人可以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可以独立地参与社会经济交往。相对方可以不必和法人团体中的各个成员交易而只需和法人交易即可达到相同甚至更好的交易效果,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法人制度的创立及权利能力的赋予,实为文明社会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尽管权利能力的创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该理论内含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德国人在创立此概念时不自觉地形成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德国民法虽创设权利能力之用语,并使用该辞句以建制度,然并未对于权利能力加诸定义。”<sup>[3]176</sup>在德国,对权利能力的定义散见于各法学专著和教科书中,一般解释为“足堪拥有权利或肩负义务之能力”<sup>[3]176</sup>。这种定义过于模糊,未能明确点出创设该概念的初衷,即赋予法人或自然人以主体资格。由于当时未能考虑赋予资格之对象(特别对于法人来说)存在的诸多限制,使得后世在解释这一概念时产生很多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处。这些混乱和矛盾后来成为学者们在权利能力制度上截然对立的观点冲突的根源,也导致了許多实践性问题无法解决。

在我国,对于法人的权利能力,学者们一般的表述是:使得法人可以充当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地位或资格<sup>[4]170</sup>。将权利能力与地位或资格联系起来,这符合德国民法创立该制度的初衷。而随后,学者们又指出,法人的权利能力要受到诸多限制,如自身性质的限制、法规的限制和目的的限制等等,从而导致不同的法人具有不同的权利能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从定义可以看出,法人的权利能力仅仅是一种地位或资格,而我们知道,地位或资格都“只有有无之分,而无大小之分”<sup>[5]100</sup>,它对于所有法人来说都只是一种抽象的主体资格的存在,并无差别可言。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多种限制,实际上是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是特殊的,不同的法人享有不同的权利能力。这就直接违背了定义所确立的标准,也背离了民法上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需要重新审视该制度本身了。我们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含混的概念,需要对其加以层次化,建立起有机体系,以避免矛盾冲突。因此,我们拟提出一个概念:权利能力分层理论(以下简称分层理论)。将法人的权利能力划分为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两个层次。前者从一般的、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解决的是法人之所以能成为民事主体的资格问题;后者是从特殊的、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解决的是法人可在多大范围内参与民事交往的问题<sup>[6]</sup>。前者事关资格,是从所有的法人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最普遍的适用意义。法人资格的取得,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其抽象权利能力的取得。而具体权利能力则是区别不同法人的标志。不同的法人享有的权利范围是不同的,尽管它们都具有权利主体的资格,但在具体权利能力上会有所差别。

对于分层理论,有几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具体权利能力必须以抽象权利能力为基础。法人只有获得了抽象权利能力,才谈得上具体权利能力的享有。但对于法人来说,仅仅具备抽象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够的。因为此时的法人只是具备了一种享有权利的地位或资格。由于种种限制的存在,法人不可能从事所有活动,享有一切权利和负担一切义务,如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就不可能去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此时,就要赋予法人具体权利能力,以确定其权利义务的范围。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具有抽象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当然能够从事任何具体的民事活动,只有具体的民事权利能力,方能在该民事法律关系中成为主体。”<sup>[6]</sup>第二,抽象权利能力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仅仅是法人所获得的一种地位而已,并不存在范围大小的问题。而具体权利能力具有伸缩性,国家法律的修改或是法

人本身通过合法程序对自身的经营范围进行变更,都会导致法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如果把抽象权利能力比作一条直线的话,那么具体权利能力就是该直线上的一组点。所有的直线都是一样的,但直线上具体的两组点可能会完全相同,也可能会完全不同,还可能会部分重合。同理,任何两个法人的经营范围之间必然会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第三,法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只与抽象权利能力有关,与决定法人权利范围的具体权利能力毫无关联。有学者认为,具体权利能力也是一种资格或地位<sup>[6]</sup>。这是值得商榷的。第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法人的权利能力虽分为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但我们通常所讲的法人权利能力仅仅是指抽象权利能力而言,即法人可以为主体的资格。

从分层理论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在论及法人权利能力时所出现的矛盾很容易解决。学者们对法人权利能力的定义实际上只是指抽象权利能力,而其随后所论述的法人在限制范围内所享有的权利能力,则是具体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创立初衷只是要给法人提供一种可为权利主体的资格或地位而已,立法的着眼点仅仅在抽象权利能力。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法人具有不同的权利范围;国家出于各种考量也给予不同的限制,此乃社会生活的必然,是我们承认法人具有主体资格的必然结果。但这些并不在德国人创设权利能力时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人只是创设了抽象权利能力,而忽略了具体权利能力。但忽略它并不等于它不存在,不可否认的是,自德国民法首创“权利能力”以来,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都一直客观存在。

## 二、权利能力、人格与分层理论

人格与权利能力是具有较大重合性的两个概念,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对分层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也有莫大的帮助。理论界在两者的关系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权利能力即人格。如梅仲协先生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之别称”<sup>[7]153</sup>。施启扬先生认为“权利主体,权利能力和人格三者的含义相同”<sup>[8]165</sup>。日本学者四宫和夫也认为“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sup>[9]145</sup>。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格与权利能力不可等同。如江平先生认为,就法人来说,“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则是指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后者是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范围”<sup>[10]13</sup>。朱文杰先生认为,“如果说权利能力等于人格,则由于自然人的人格一律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就应一律平等,得享有同等范围之权利。但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而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则根本不一致(法人权利能力范围依目的范围而定)。如此一来,一方面说‘权利能力(即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又说不同自然人或法人之间‘权利能力(即人格)有差异’,岂不自相矛盾?”<sup>[11]</sup>

这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客观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权利能力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认为,从人格与权利能力演变的角度入手是较为明智的。如前所言,法国首先在其民法典中采用“人格”这一概念,将其作为一种抽象之存在,并规定“所有人的人格一律平等”,以高度抽象化为特征的德国民法在吸收法国民法中“人格”的内涵的基础上,将该“人格”观念细化为完全法律辞句的“权利能力”一语,并将其赋予同样首创的法人。但是,从德国法创设权利能力之初衷来看,权利能力与人格在赋予某一对象的主体资格上存在本质的统一性。从分层理论的观点来看,“人格”实际上就是“抽象权利能力”,两者之间可以划上等号。但我们不能说人格就是权利能力,因为发展到现代的权利能力已不是其初创时的内涵所能容纳得了的。这里的权利能力是有层次的,其中的具体权利能力无论是对于法人还是自然人来说都存在差异,而人格与抽象权利能力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的地位,对自然人和法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所以,认为权利能力即为人格的观点是

错误的。而认为人格与权利能力不能等同的观点,由于缺乏分层理论的支撑,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江平先生认为人格是可以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权利能力是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实际上,不管是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还是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都是指抽象权利能力。只不过前者是讲资格的表象,即得为权利主体;后者说的是资格的内涵,即得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此表象与内涵对任何人(不管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一种抽象的地位而已。而且,所谓的“权利能力是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有的权利范围”实际上是指具体权利能力。由于缺乏分层理论的支持,未能认识到权利能力中内含的抽象和具体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力,该观点把权利能力要么归结为一种对任何法人无实质区别的地位,要么归结为一种可大可小的享受权利的范围,从而导致了自身逻辑上的矛盾。朱文杰先生从其所反对的对象,即权利能力等于人格出发,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证明其观点之正确性。但是如果运用分层理论,此矛盾根本就不存在。人格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权利能力,它只相当于权利能力中的抽象权利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然人或法人的人格一律平等,但其享有权利的范围(即具体权利能力)则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按照分层理论,对于法人来说,其人格相当于抽象权利能力,都是一种资格或地位;人格与具体权利能力,即法人得享有权利的范围没有关系。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人格是不是等同于权利能力,而应该对权利能力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层次感的概念。

### 三、分层理论在公司法上的意义

#### (一) 分层理论与公司越权行为

“越权无效”是传统公司法所坚持的理论原则。然而,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该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主张废除“目的限制”和“越权无权”原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些国家逐渐对“目的限制”和“越权无效”原则进行了修正和改革。例如,欧共体1968年颁布的公司法第一号指令规定:由公司机关实施的行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即便这些行为不在公司的目的范围之内。美国1950年修正的《标准商事公司法》第七条规定:公司之行为或公司转让,受让动产、不动产的行为,不得因公司无此权利能力而无效。从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也是否认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其目的范围限制的。

从越权无效到越权有效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法律制度变革作出的要求。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越权有效而公司仍对其越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其理论依据在哪里?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主体资格能力,自然不应受其目的范围的限制。否则,法人超出其目的范围所为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就不应由法人承担。因为此时法人已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不是民事主体了。”<sup>[12][156]</sup>该观点紧紧扣住了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存在之先决条件,认为越权即无权利能力,亦无主体资格,其责任到底由谁承担就成了问题。然而,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公司越权,最后承担责任的仍然是公司,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公司的权利能力受到其目的限制,其越权进行交易行为,就不再具有权利能力,也就不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此时的“公司”就像一件物品,物品伤人,承担责任的不是物品,而是使用物品的人,公司无主体资格却要承担责任,这不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吗?

为解决这一矛盾,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点。如权利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说、经营行为限

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规定,企业法人超越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从事法律废止的其他活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之一的,法人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

制说、代表权限制说以及内部责任说,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在解释法人目的限制的性质这一问题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都难以称为完满无缺,因为在理论上都明显地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问题<sup>[6]</sup>。

然而,在分层理论看来,越权有效所导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根本就不存在。按照该理论,权利能力分为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法人目的限制只是针对具体权利能力而言,公司的越权行为所突破的也仅仅是具体权利能力,因为这一层次的权利能力就是公司所享有的权利的范围,突破了这一范围,也就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公司越权。但作为公司主体资格的抽象权利能力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公司仍然是个民事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的“物”,此时让公司去承担因越权行为而导致的责任自然顺理成章。这样,分层理论由于自身设计的层次性特征,使得越权行为只突破权利能力的第一道防线,而公司仍然保有主体资格,仍有承担责任的正当性依据,这就妥善保护了股东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维护了交易安全,也为越权有效原则在各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 分层理论与公司人格否认

公司人格否认,又称“揭开法人面纱”,指为阻却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定给予其背后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或制度<sup>[13]75</sup>。该制度最早出现在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中,主要是针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事后规制手段,后为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广为采用。

与越权行为仍肯定公司的主体资格及让其承担责任不同,公司人格否认则完全否定了公司独立人格存在的可能性。对这一制度之理论基础,学者们一般从人格而非权利能力的角度去分析,认为“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过度控制,使其完全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法院就要揭开公司这层面纱,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人直接负责”<sup>[14]</sup>。从上文所讲的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关系,我们知道,人格即权利能力中的抽象权利能力,对人格的否认也就是对抽象权利能力的否定,即当出现需要否认公司人格的时候,否认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此时,公司与作为客体的“物”已无区别,公司已不能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了,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公司的股东。如果说越权行为是对公司权利能力第一层防线的突破,那么,公司人格否认就是对其第二层防线的突破,彻底否定了公司的抽象主体资格。但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越权行为一定是突破了公司的具体权利能力而没有突破其抽象权利能力;公司人格否认一定是突破了公司的抽象权利能力,但其是否突破了具体权利能力则是不肯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既可能在其目的范围内活动,也可能不在这个范围内活动。

## (三) 分层理论与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在理论界争论得比较激烈。“因公司系法人,欠缺自然人死亡时之继承制度,其结果,除合并、分割或破产外,公司因解散当然进入清算程序。”<sup>[15]114</sup>在清算过程中,清算人要对内对外进行各种活动,为使公司与清算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明确并便于清算活动的进行,实有必要确定公司在清算中的法律地位。对此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拟制存续说。即公司因解散而丧失权利能力,不得从事其经营范围内的活动,但由于法律的拟制使公司在清算的目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能力,从法人解散到清算完结,此阶段视为法人仍然存续。(2)清算法人说。即公司因解散而消灭其主体资格,但由此又会导致财产成为无主财产,因此,法律专为公司的清算目的而设立了一种清算法人,这种法人的能力是特殊的,不再享有原法人的能力,原法人的能力也因解散而消灭,不再转移给新法人。(3)同一人格说。即清算公司与解散前的公司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权利能力范围的缩小而已。这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存在着不足之处。“拟制

存续说“把法人解散后在清算过程中了解以前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本来就有的权利认为是拟制的权利,显然过于牵强;“清算法人说”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即它不能说明公司因解散而消灭其法人资格,为什么清算结束后才进行注销登记,也不能说明专为清算目的而设立的清算法人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财产等条件是否具备<sup>[16][245]</sup>。相比之下,“同一人格说”较为学界所认同<sup>[10][159-160]</sup>。但该学说的缺陷也很明显。因为它把权利能力仅仅看作是法人享有权利的范围而已。如果笼统地认为权利能力的范围可以缩小,则与权利能力作为主体的资格和地位相矛盾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区分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所致。

从分层理论的角度来看,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很好确定。当公司被宣布解散后,其抽象权利能力仍然存在,公司仍然是法律上的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但其具体权利能力却发生了变化。由于具体权利能力的伸缩性特征,公司宣布解散的同时,其享有权利的范围马上缩变为只与清算目的相关的事项。分层理论的这种应用使得清算前和清算后的公司保持了主体资格上的连续性,并借助于具体权利能力的伸缩性变化使得公司享有权利的范围始终为其主体资格的存续目的服务。这样,清算中的公司完全可以以自己而非清算组的名义去了结债权债务关系、参加起诉和应诉等。在我国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公司解散后必须以清算组而不是公司的名义参与诉讼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与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是不吻合的。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清算人执行清算事务,有代表公司为诉讼上或诉讼外一切行为之权。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该法条是将清算人作为公司清算期间的一个代表机关,必须以公司的名义为各种行为。这一规定实际上已承认了公司在清算期间的主体地位。

所以,公司在清算期间的抽象和具体权利能力都没有丧失。前者一直保持同一性,没有任何变化;后者则仅局限在清算范围内。只有当清算完毕后,两者才归于消灭。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由此可知,公司的这两种权利能力应在清算完结后因公司登记的注销而消灭。清算组不为申请注销登记的,因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而消灭。

需指出的是,运营中的公司因违法行为或其他事由被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抽象权利能力(即人格)并未丧失,只是具体权利能力受到限制,不能对外开展营业活动而已。这与清算后的公司因营业执照的吊销而丧失两种权利能力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如果运营中的公司因营业执照的吊销而丧失抽象权利能力,则公司因主体资格的消灭而使其财产成为无主之物,这无论对于股东还是债权人的保护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此种营业执照的吊销虽然没有影响到公司人格的存续,但却限制了公司的具体权利能力,使其不得对外开展活动,而应立即转入清算程序。

透过以上三种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分层理论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当然,该理论应用不止这些方面。作为一种民事主体理论,分层理论在公司法的其他方面还有很大的适用余地。借用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的分离,我们可以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民商事领域中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得出合理的结论。

## [参 考 文 献]

[1] 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J].法学评论,2004,(5):6.

- [ 3 ] 曾世雄. 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 [ 4 ]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 [ 5 ] Carlos Alerrto da Mota Pinto. 民法总论[M]. 林炳辉,译. 澳门: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
- [ 6 ] 刘沅涛. 试论法人民事权利能力二重性[EB/OL].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6/9/0942017926.htm>, 2004-06-09/2005-06-21.
- [ 7 ] 梅仲协. 民法要义[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 [ 8 ] 施启扬. 民法总则[M]. 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1993.
- [ 9 ] 田宫和夫. 日本民法总则[M]. 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 [ 10 ] 江平,赵旭东. 法人制度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 [ 11 ] 朱文杰,季铭,江诗伟,等. 民事权利能力若干问题研究[EB/OL]. <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6674>, 2004-06-22/2005-06-21.
- [ 12 ] 马俊驹,余延满. 民法原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 13 ] 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 14 ] 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母子公司中的运用[J]. 法律科学,1998(5):40.
- [ 15 ] 柯芳枝. 公司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 [ 16 ] 冯果. 公司法要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徐丽静]

##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erson' Double-layer Theory of Rights Capacity and its Meaning in Corporation Law

LI You-xing, CAO Shao-ming, LIU Wei

(Department of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rights capacity in the German civil code, this concept has been accepted by many nation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is a shortcoming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In many scholars' works, rights capacity express not only qualification or status but the concrete scope of enjoying rights and taking on obligations,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many conflic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origin of rights capacity and the viewpoints of the scholars,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ouble-layer theory of rights capacity that is classified into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and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The former settles the problems of qualification that judicial person could be a civil main body from the angle of abstract civil legal relations; the latter settles the problems of the scope in which judicial person could take part in the civil intercourse from the angle of concrete civil legal relations. Furthermore, the former makes judicial person obtain the status of main body; the latter limits the scope in which judicial person could enjoy rights and take on obligations. Thus, the content contained in the system of traditional rights capacit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establishing the rights capacity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layers.

Based on the double-layer theory of rights capacity,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rights capacity and personality. In fact, the personality of judicial person is equivalent to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being independent of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Therefore, it is not proper to equate the personality with rights capacity.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uble-layer theory to corporation law, the paper addresses these three aspects: (1) The ultra vires act of corporation is jus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while the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of corporation (namely, personality) is not negated at all; so the corporation

should take on legal obligation for its ultra vires act. (2)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negates corporate personality (namely,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completely and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directly be held responsible. Nevertheless, the corporation's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is not necessarily affected, because the stockholders' irregularity act may not in the scope of intention. (3) None of the corporation's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and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is in forfeiture in liquidation. The former does not change at all and the latter is limited in the scope of liquidation. The two kinds of rights capacity die out only after the liquidation is over. So the corporation in liquidation could take part in the litigation and accomplish rights and debts in the name of its own.

**Key words:** double-layer theory of rights capacity; abstract rights capacity; concrete rights capacity; corporate personality

本刊讯 2005 年 11 月 12 日,国际著名儒学大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本刊特邀国际编委杜维明教授和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圣吉博士在浙江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学习社会与文明对话的开放式讲座。杜维明是哈佛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是国际汉学界和海外“当代新儒家”第 3 代的代表。彼得·圣吉博士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主持人,因倡导学习型组织理论及其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为大家所熟知。他于 1992 年荣获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美国商业周刊推崇他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

虽然杜维明与彼得·圣吉一年来也有几次对话,但两位东西方文化、学术方面的“大家”能进行这样公开的对话实属难得,而台湾中央大学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宋锷的精彩翻译也使对话增色不少。正如彼得·圣吉在对话开始时所说的,全球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全部交织在一起,全球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已经愈演愈烈。从杜维明与彼得·圣吉之间的思维碰撞中,可以感觉到两位学者对市场经济下的现实社会的担忧也是相通的。两位学者都主张学习组织的价值就在于如何自我超越,不仅是使企业家成为成功的经济人,而且也成为有责任感、同情心的社会人,除了物质条件外,重视精神价值。通过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学习的组织,最终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杜维明与彼得·圣吉还对在场的陈俊明、余潇枫、张钢三位浙江大学教授的点评分别做出了回应。

此外,同行抵抗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协会的核心成员尼克·赞纽克和高让·卡斯德特还分别做了题为“21 世纪领导模式的挑战”和“如何领导基于活力与信任的变革”的演讲。

本刊讯 由浙江大学和丰田财团主办的“东亚的文化人与共同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杭州召开,国内外知名学者共 28 人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学者主要来自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包括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实先生,以及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高丽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东亚地区的知名学者。在 6 场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围绕“文化人与今日东亚”、“东亚共同认知的先行者”、“东亚共同认知的可能性”、“东亚共同认知的构造”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在随后的讨论时间内就各种观点展开了合理而激烈的讨论。在闭幕式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会议的议题集中,讨论激烈,并对东亚地区的共同发展的认知模式和发展路径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基本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标,并希望将本次研讨会成为一个关于东亚文化人讨论东亚地区共同认知的平台。